

編後語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的兩篇文章，承續上一期「『洋涇浜學風』還是『認識論特權』？」的激烈爭論，但又深入到引發這場爭論的兩個源頭，即90年代出現的中國式「新左派」與「後學」——也正是本刊最早引發了這兩個题目的討論。從1994年8月號開始，我們一連三期刊出以「經濟民主·政治民主與中國」為題的討論，崔之元在這個話題中脫穎而出，並被視為中國「新左派」代表人物。本期卞悟一文，就是對崔之元等提出的一系列觀點逐一反駁，並用「淮橘為枳」來比喻在西方和東歐具有積極批判意義的「新左派」觀點被移用於中國研究時，反而變成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工具。張隆溪一文則是接着本刊去年2月號趙毅衡、徐賁批評中國「後學」的新保守主義傾向而講下去，他呼籲不要以生活地域——大陸或海外的劃分來看待學人間的觀點差異。此外，本期「批評與回應」和「三邊互動」中，還有朱正琳、趙毅衡、汪丁丁和王紹光對上述爭論發表見解。

近百年來，每當中國社會急劇轉型的時候，知識份子就會為採用甚麼樣的西學來分析中國社會及文化的現狀，發生激烈的爭論。表面上，這些論辯的每一方都以當時最新潮的西方理論為依據，又都強調中國現狀的實際調查分析。其實，這些以西學為外衣的爭論，底子裏無不具有極強的本土性。姑不論這些爭論隱含的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不同價值取向，即從文化傳播角度看，也與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對外來文化的選擇性吸收和轉化息息相關。本期「百年中國」葛兆光、雷頤和金觀濤三篇思想史文章，正就是有關上述思想文化現象的研究。如何運用西方學理的分析工具，又立足於本國的經驗事實和文化資源，總結出對中國文明的獨特解說呢？在此，我們特別向讀者推薦何炳棣教授的長文。該文綜合了中國考古及古文字研究積累的豐富成果，提出華夏文明起源和特徵的新見解，指出恩格斯及西方政治人類學家對人類文明起源及演化的普遍性論述，並不符合中國史前和有史早期的經驗。

本期其他佳作甚多，如鄒讜與長江對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一書的不同評價；張維安、石元康兩篇韋伯社會學理論與中國研究的論文；金逸農對北京圓明園藝術群體所描繪的生動形象；乃至人體遺傳與生理研究三個重大突破的報導，都是值得讀者注意和咀嚼的。